

第一章 汉代的《史记》研究

第一节 时代背景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之一，两汉四百年学术的发展也随时代变化而具有不同的特点。汉初在长期战乱之后，需要发展经济、稳定社会，所以朝廷推行清静无为的政策，与民休息。在目睹秦朝灭亡的过程之后，当时人们也充分意识到以古为鉴的重要性。据《史记·酈生陆贾列传》记载，在汉高祖刘邦建立汉王朝后，“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祖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怩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陆贾撰《新语》指出，汉王朝必须以秦亡为鉴戒，施行仁政，实行无为而治。陆贾的主张深刻地反映了汉初社会休息民力，恢复生产的紧迫要求，所以得到高祖和群臣的赞赏，并奠定了汉初几十年间无为而治的理论基础。直到东汉初年，王充对《新语》仍给予很高的评价，说：“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鸿知所言，参贰经传，虽古

圣之言 不能过增。”^①生活在文帝时代的贾谊对秦亡教训作了更为系统的总结 他在《过秦论》中深刻地剖析秦朝成败兴亡之理。司马迁对《过秦论》由衷称赞：“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②并在《秦始皇本纪》及《陈涉世家》中大段引用了《过秦论》的原文。与贾谊同一时代的政治家贾山写有《至言》 在总结历代兴亡的经验的基础上 得出“人主不得闻其过失”“则社稷危矣”“闻其过失而改之 见义而从之，所以永有天下也”的结论。^③可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当朝者提供鉴戒已成为当时有识之士的共识 这种重视反思历史 以史为鉴的做法对司马迁也产生很大影响。

西汉初年 在文化学术方面 政府一般不加以干预 因而自汉初至文、景及武帝前期 仍然延续了战国时期各家学说互相交流融会 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与西汉国力处于上升时期相适应，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也都呈现出一派蓬勃的生机，《史记》就是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下产生的。

到武帝时 采纳董仲舒提出的‘今师异道 人异论 百家殊方 指意不同 是以上亡以持一统 法制数变 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 皆绝其道 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 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④的建议，把不符合统治者需要的各家学说都作为罢黜压制的对象。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政策的推行 儒家思想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其后 汉宣帝召集群臣在石渠阁论经 并亲临决断 定五经异同。东汉章帝在建初四年（79年）召开白虎观会议 将讖纬与今文经学混为一体 作为整个社会的主导思想 并将强调‘君臣之正义 父子之纲纪’等集政治、道德、伦理为一体的种种规定都写进《白虎通义》中 明显加强了对人们思想

① 《论衡·案书》，《论衡校释》[汉]王充著 黄晖校释 中华书局 1990年版。

②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 1982年版。

③ 《汉书·贾山传》中华书局 1962年版。

④ 《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 1962年版。

的钳制。东汉时期 儒学与阴阳五行和讖纬学说相结合 使得阴阳灾异说和讖纬迷信在当时社会上广为流行。这一时期，有一些有见识的学者继承了孔子、司马迁以来不妄论灾异 重视人事 重视总结政治成败经验的传统，对唯心迷信的讖纬学说作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和批判。这在王充、桓谭等学者对《史记》的评论中也有所反映。^①

西汉王朝建立后 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已注意到史书编纂的重要性，但史官的政治地位与治经的儒生相比还是相差很远的。西汉时期，经学的繁盛为历史著述提供了一些可供借鉴的材料及著作形式 这在一定程度为史书的编纂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而经学的繁盛及儒家思想的独尊又使史学始终处于经学附庸的地位，不利于史学的独立发展。在充分利用经学著述的资料和形式的同时，史家们也大多以五经为标准，将自己的史著视为经学的辅翼和对经学的解说。

西汉后期 随着儒家经学独尊地位的确立 史书编纂更加成为经学的附庸。当时从事史书编纂的学者，主要也是以治经为主的。如褚先生就是以经术为郎 后为博士 并师事大儒王式。刘知几在《史通·史官建置》中说续写《史记》者都是“并以别职来知史务”太史公一职已名存实亡 只是执掌四时星历之事 这对史学发展是没有好处的。西汉末扬雄力倡宗经，对儒家经典极力推崇，虽然他曾校理群书 续写《史记》 并肯定司马迁的实录精神 但又对司马迁及《史记》不完全符合儒家经典学说多有微词。

东汉初年，儒家思想已占绝对的统治地位。同时东汉也是史学批评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这个时期的史学著作呈现初步繁荣 史书类别比先秦时期明显增多，其中便有对史籍和史事进行评论的史评。东汉史学虽有了进一步发展，但依然笼罩在经学的影响之中，班固《汉书·艺文志》将《史记》等史书收入“六艺略”的“春秋类”中 居于六艺之末。直到魏晋南北朝时 儒家统治地位被动摇 史学才从经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 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 并得到飞速发展 出现了十分繁荣的景象。但整个封建社会中 经学对史学的影响始终存在 只

参见《后汉书·桓谭传》 中华书局 1965 年版。

是不像两汉时期那么突出罢了。

两汉时期的《史记》研究虽然刚刚起步 却已对《史记》的思想、取材、体例等许多方面进行了评论，虽大多只是简单提及，没有作进一步深入的讨论 但对后代《史记》研究很有启发 后代史记学研究基本上是围绕汉代提出的问题进行的，并在其基础之上，不断有所开拓。这一时期的《史记》评论的代表人物是扬雄、王充、班彪、班固 其中扬雄提出“实录”、“爱奇”等说法 王充所提出的班彪《后传》优于《太史公书》的评论 班彪、班固对《史记》体例、风格、思想等方面的批评 都对后代《史记》评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外，一些东汉学者对《史记》有零星的评论。如张衡，《后汉书·张衡传》记载张衡奏上司马迁、班固所记史事与典籍不合的十余件，其中有一条为：“史迁独载五帝 不记三皇 今宜并录。”可见当时学者对远古的历史很关心，并要求在史书中有所著录。

《后汉书·张衡传》中还记载 张衡作《应间》 其中提到：“故一介之策 各有攸建 子长谋之 烂然有第。”章怀太子注：“司马迁字子长，作《史记》 著功臣等传 烂然各有第序也。”称赞《史记》为功臣立传，叙事清楚有序，各有特点。

东汉刘毅也进一步提出作史要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主张：“臣闻《易》载羲农而皇德著，《书》述唐虞而帝道崇。故虽圣明 必书功于竹帛 流音于管弦。”古之帝王 左、右置史。汉之旧典，世有注记。夫道有夷崇 治有进退 若善政不述 细异辄书 是为尧、汤负洪水、大旱之责 而无咸熙、假天之美。”^① 强调没有史书的记载，君王的业绩就不能彰扬。

第二节 《史记》流传中的几个问题

一、残缺和续补

两汉时期 是《史记》成书、传播和学者们开始对其进行研究的时

^① 《后汉书·和熹邓后纪》 中华书局 1965 年版。

期。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总结自己作史的情况时说：“凡百三十篇 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为《太史公书》。序略 以拾遗补艺 成一家之言 厥协六经异传 整齐百家杂语 藏之名山 副在京师 俟后世圣人君子。”司马贞《史记索隐》对此的注释为：“言正本藏之书府 副本留京师也。《穆天子传》云‘天子北征 至于群玉之山 河平无险 四彻中绳 先王所谓策府’。郭璞云‘古帝王藏策之府’。则此谓藏之名山是也。”他认为司马迁所说的“名山”是指皇家藏书之地。尽管后人 对司马迁所说的“名山”、“京师”的含义有不同的认识 但大多根据司马迁这段自述认定《史记》最初完成时有司马迁手定的正副两本。

据《汉书·司马迁传》记载：“迁既死后 其书稍出。宣帝时 迁外孙平通侯杨惲祖述其书 遂宣布焉。”这里提到司马迁去世后“其书稍出”并将其与杨惲“遂宣布焉”相对而言 可见《史记》在司马迁去世后不久 就慢慢在民间流传 但正式将《史记》一书公之于世却是在宣帝时由司马迁外孙杨惲完成的。《汉书·杨敞传》后附的《杨惲传》中记载：“惲母 司马迁女也 惲始读外祖《太史公记》 颇为《春秋》 以材能称。杨惲认真研读《史记》 并献出家中所藏的《史记》原本 促进了《史记》的传播 扩大了《史记》的影响 为学者们提供了对《史记》进行学习和研究的条件。”

西汉朝廷对《史记》控制很严 据《汉书·宣元六王传》载 成帝时，东平思王刘宇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 对曰：‘臣闻诸侯朝聘 考文章 正法度 非礼不言。今东平王幸得来朝 不思制节谨度 以防危失 而求诸书 非朝聘之义也。诸子书或反经术 非圣人 或明鬼神 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 汉兴之初 谋臣奇策 天官灾异 地形阨塞 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对奏 天子如凤言 遂不与。”这说明到成帝时 诸侯王想读《史记》 还要向皇帝呈请。《汉书·叙传》记载班固仲祖班斿博学多才 与刘向同校秘书 成帝很欣赏和器重他的才能 为表示嘉奖，“赐以秘书之副” 其中就包括《太史公书》 因当时“时书不布” 与东平思王求《太史公书》未获批准相比，整个班氏家族都为此感到荣耀。由此可见在西汉要见到《史记》还不是件很容易的事。由于《史记》篇帙

巨大 再加上个人需要不同 所以当时《史记》经常是单卷别行，《后汉书·窦融传》记载光武帝非常赏识窦融，“乃赐融以外属图，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传》”。这是见于记载的《史记》单篇流行的开始《后汉书·王景传》中也记载明帝时因王景治水有功，就赐他《河渠书》。可见在汉代《史记》常常是单卷别行的 这也是后来《史记》篇章散乱缺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史记》记事截止汉武帝时期 随着《史记》的流传 开始有人续写《史记》未涉及的武帝以后的西汉史 东汉出现的续写《史记》之作就有十几家。另外 由于《史记》在流传中有残缺 汉代也出现了以褚少孙为代表的补缺之作。续写与补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对《史记》记事下限的延伸，一个是对其篇章残缺错乱的纠正和补充，其出发点是有所不同的。

据《后汉书·班彪传》记载 班彪认为：“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于是班彪“乃继采前史遗事 傍贯异闻 作后传数十篇 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李贤注：“好事者谓扬雄、刘歆、阳城衡、褚少孙、史孝山之徒也。”王充《论衡·须颂》中说：“司马子长纪黄帝以至孝武 扬子云录宣帝以至哀、平。”提到扬雄曾续写《史记》未记载的西汉宣帝至哀帝、平帝时期的历史 可惜今天扬雄所续写的《史记》已不传。今本《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的“太史公曰”中讲：“扬雄以为靡丽之赋 劝百风一 犹驰骋郑卫之声 曲终而奏雅 不已亏乎？”司马迁作《史记》时不可能收入生活在东汉的扬雄的评论，这段话为后人所加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否扬雄所续加，就不得而知了。

除班彪提到的几个好事者之外，《汉书·艺文志》“春秋家”下还著录了“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据颜师古《汉书注》“(商)后事刘向”冯商是刘向的弟子。韦昭注中也提到：“冯商受诏续《太史公》十余篇 在班彪《别录》。商字子高。”唐代刘知几在《史通·古今正史》中又讲：“《史记》所书 年止汉武 太初已后 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 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 迄于哀、平间 犹名《史记》。”

至建武中 司徒掾班彪以为其言鄙俗 不足以踵前史 又雄、歆褒美伪新 误后感众 不当垂之后代者也。于是采其旧事 旁贯异闻 作《后传》六十五篇。可见东汉续写《史记》的有十几家 只是这些续写之作均已失传。

对班彪为续写《史记》而作的《后传》 人们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王充将其与董仲舒整理总结孔子的学说相提并论。《论衡·案书》中说：“孔子生周 始其本 仲舒在汉 终其末 尽也。皮续《太史公书》 盖其义也。”司马贞《史记索隐后序》也说：“彪既后迁而述 所以条流更明，是兼采众贤 群理毕备 故其旨富 其词文 是以近代诸儒共行钻仰。”郑樵《通志·总序》中说：“善学司马迁者 莫如班彪。彪续迁书 自孝武至于后汉 欲令后人之续己 如己之续迁 既无衍文 又无绝绪 世世相承 如出一手 善乎其继志也。”从这些评论可以看出 班彪所作《后传》 在当时诸多《史记》续写之作中 可算是一佼佼者 在体裁、内容及风格方面都对《史记》有所继承 并且体例比《史记》更加完善 难怪班彪要指责其他续作“其言鄙俗”了。但此书今已失传，我们只能从班固的《汉书》中寻找班彪《后传》的痕迹了。

李贤在《后汉书·班彪传》注中提到的补作《史记》的‘好事者’中，还包括了褚少孙 但应该注意的是 班彪和其他人续写《史记》未记的武帝之后的西汉史与褚少孙补《史记》之缺是两回事，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关于《史记》的残缺 裴骃在《史记集解》中引《汉旧仪》卫宏曰：“司马迁作《景帝本纪》 极言其短及武帝过 武帝怒而削去之。”卫宏是见于记载的最早提出《史记》有亡缺的人。此后 魏王肃、西晋葛洪继承了卫宏的‘削书说’ 分别在《三国志·王肃传》及《西京杂记》卷六中阐述了类似的观点。但因《汉书》注家臣瓚、晋灼等都指出卫宏书中有许多错误，所以他的“削书说”受到历代学者的非难。特别是清代学者多以《史记》本身的内容为依据 对“削书说”进行反驳。如梁玉绳以《太史公自序》为依据 驳斥“削书说”：“且史公《自序》曰：‘天下翕然 大安殷富 作《孝景本纪》。汉兴五世 隆在建元 作《今上本纪》。’可知纪中必不作毁谤语 只残缺失传耳 岂削之哉 且《封禅》、

《平准》诸篇 颇有讥切 又何以不削 而其余八篇 不尽是讥切 非关怒削 又何以俱亡?’^①汪师韩《韩门缀学》卷二桂馥《晚学集》卷四中对“削书说”不可信的问题也有详细论述。清人的这些说法是很有道理的,《史记》卷帙浩大 而且经常单卷别行 同其他古书一样 在流传过程中产生残缺是在所难免的,未必与政治有联系。正如李长之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中所说:“为什么缺 是触忌被削 还是偶尔散逸?前者的可能性似乎小。因为就现存的书看,其中触忌的也仍然不少,讽刺的也已经相当厉害,亡失的几篇也不会更刻毒到什么地步。偶尔散逸,却比较近情些。这是因为,《史记》一书最初的流传 是各篇单行的 散逸的几篇(假如真有散逸)也许是受了自然淘汰的结果。”^②

《史记》有“十篇之缺”的说法始于班氏父子,《汉书·艺文志》中说:“《太史公》百三十篇。!篇有录无书。”《汉书·司马迁传》及《后汉书·班彪传》中也都提到《史记》“十篇缺”的问题。但亡缺原因及内容,《汉书》中没有提到 后世学者对此多有考证和论述。

“有录无书”的十篇,究竟是司马迁尚未完成,还是在流传过程中遗失的,对此历代学者说法不一。三国魏张晏在其《汉书音释》中讲:“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 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言辞鄙陋 非迁本意也。”张晏书今已不传,《史记集解·太史公自序》及颜师古注《汉书·司马迁传》时,都引用了他的说法,即认为在司马迁去世后,《史记》有十篇亡缺 后由褚少孙进行了续补。在张晏说法的基础上 南宋陈振孙指出:“今案此十篇者皆具在 褚所补《武纪》全写《封禅书》,《三王世家》但述封拜策书,二列传皆猥醜不足进。而其余六篇,《景纪》最疏略,《礼》、《乐书》誉荀子《礼论》、河间王《乐记》。《傅

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七,中华书局 1981 年 4 月版。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第六章,三联书店 1984 年版。

靳列传》与《汉书》同而《将相年表》迄鸿嘉则未知何人所补也。”他继承了张晏提出的《史记》十篇全亡有录无书的说法，只是对所亡十篇是褚少孙根据其他书籍资料所补，还是另有他人补缺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唐代刘知几认为《史记》是未成之作，他在《史通·古今正史》中说：“至宣帝时，迁外孙杨惲祖述其书，遂宣布焉。而十篇未成，有录而已。元、成之间，会稽褚先生更补其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等传，辞多鄙陋，非迁本意也。”认为司马迁生前只列出了十篇的题目，而没来得及完成。司马贞在《补史记序》中的说法与刘知几类似，认为司马迁是“遭逢非罪，有所未暇，故十篇有录无书是也”。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还进一步指出后人所补各篇的来历：“《景纪》取班书补之，《武纪》专取《封禅书》，《礼书》取荀卿《礼论》，《乐》取《礼·乐记》，《兵书》亡，不补，略述律而言兵，遂分历述以次之。《三王系家》空取其策文以缉此篇，何率略且重，非当也。《日者》不能记诸国之同异，而论司马季主。《龟策》直太卜所得占龟兆杂说，而无笔削之功，何芜鄙也。”认为后人补《史记》只是拼凑一些文字来凑足篇数，并没有理解司马迁确立各篇名目的真正目的，从而使得后代所补的《史记》各篇内容芜杂，没有可取之处。

根据司马迁自述来分析，司马迁生前应该已亲手完成了《史记》。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太史公自序》中也讲：“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已提到了《史记》的具体篇数和字数，那么《史记》全书应该已经完稿。

清赵翼对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年代及写作过程有详细考证：“司马迁《报任安书》谓：‘身遭腐刑而隐忍苟活者，恐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论者遂谓迁遭李陵之祸始发愤作《史记》而不知非也。其《自序》谓‘父谈临卒，属迁论著列代之史。父卒三岁，迁为太史令，即絀石室金匱之书。为太史令五年，当太初元年，改正朔，正值孔子《春秋》后五百年之期，于是论次其文。会草创未就，而遭李陵之祸，惜其不成，是以就刑而无怨。是迁为太史令，即编纂史事，五年为太初元年，则初为太史令时乃元封二年也。元封二年至天汉二年遭李陵之祸，已十年。又《报任安书》内谓‘安抱不测之罪，将迫季冬，恐卒然不讳，则仆之意终不得达，故略陈之。’安所抱不测之罪，缘戾太子以巫蛊事斩江充，使安发兵助战，安受其节而不发兵。武帝闻之，以为怀二心，故诏弃世。此书正安坐罪将死之时，则征和二年间事也。自天汉二年至征和二年，又阅八年。统计迁作《史记》前后共十八年。况安死后，迁尚未亡，必更有删订改削之功，盖书之成凡二十余年也。”他认为司马迁作史是在“为太史令五年，当太初元年，改正朔，正值孔子《春秋》后五百年之期，于是论次其文。”司马迁是要继承其父遗志，效法孔子作《春秋》而开始《史记》写作的，一般人认为司马迁是在遭李陵之祸以后才发愤作《史记》是不正确的。他又结合《报任安书》的内容进行分析，认为司马迁写《史记》前后共历时二十余年，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司马迁已全部完成了《史记》，而且《史记》已是经过司马迁自己“删定改削”的成熟之作，不可能是草创未就。^①

对于《史记》亡缺的篇目，各家也说法不一。如宋吕祖谦认为《史记》亡佚的只有《武纪》一篇：“以张晏所列亡篇之目校之《史记》，或其篇俱在，或草具而未成。惟《武纪》一篇亡耳。”^②清梁玉绳又提出亡书十篇乃七篇之讹的说法：“盖《史记》凡缺七篇，‘十篇’乃‘七篇’之讹，故《两汉书》谓十篇无书者固非，而谓九篇具存者尤非也。七篇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司马迁作史年岁》条，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吕祖谦《东莱别集》卷十四‘辨《史记》十篇有录无书’条，中华书局 1991 年版。

者，《今上本纪》一，《礼书》二，《乐书》三，《历书》四，《三王世家》五，《日者传》六，《龟策传》七。或问以十篇为七篇之讹何据 曰：《史》、《汉》中‘七’‘十’两字互舛甚多 并辨见各条。而其所以误者 篆隶字形相似，《隶释·孔和碑》三月二十七日是已。”

各家之所以对《史记》的亡缺产生如此众多的分歧，是因为班氏父子反复申明《太史公书》十篇有录无书 而今本《史记》十篇俱在 这也是各家对《史记》具体残缺篇目产生分歧的根源所在。尽管对所亡篇目及原因各家说法不一，但《史记》开始流传时就有残缺亡佚却是不争的事实。至于亡缺各篇的具体情况 应该从《史记》本身入手 进行具体分析。李长之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中说：“《史记》有零星的补缀 却无整篇的散亡。《史记》每一篇中都不免有点假 但每一篇也都有一部分真。它像陈年的古董一样，修补和锈蚀是不免的，但原物的神态却也始终古意盎然，流动在每一部分里。”这种说法虽没有确凿的材料依据，但这种大胆的推论，也给了我们一些启发：只有从《史记》全局出发 对一些具体篇目和相关问题作较为深入的探求 才能真正搞清《史记》亡缺的问题。

各家在谈到《史记》补缺之作时，都提到了褚少孙，与汉代续补《史记》的十几家不同 褚少孙可以算是真正补《史记》之缺的 他所补的文字与《史记》相辅而行 并以“褚先生曰”标明 以有别于司马迁《史记》的原文。如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中说：“后进好事儒者褚少孙曰：太史公记事尽于孝武之事，故复修记孝昭以来功臣侯者，编于左方 令后好事者得览观成败长短绝世之适 得以自戒焉。”在《滑稽列传》中说：“窃不逊让 复作故事滑稽之语六章 编之于左。可以览观扬意，以示后世好事者读之，以游心骇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说明自己补作的目的 并没有要和《史记》合为一体之意。

褚少孙十分喜爱《史记》 在宫中做郎官时 他有机会读到皇家所藏《史记》的副本。他在《三王世家》中提到：“褚先生曰 臣幸得以文学为侍郎 好览观太史公之列传。传中称《三王世家》文辞可观 求其

世家终不能得。窃从长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书，编列其事而传之，令后世得观贤主之指意。”《龟策列传》中说：“褚先生曰：臣以通经术，受业博士，治《春秋》，以高第为郎，幸得宿卫，出入宫殿中十有余年。窃好《太史公传》。……臣往来长安中，求《龟策列传》不能得，故之大卜官，问掌故文学、长老习事者，写取龟策卜事，编于下方。”这说明他对《史记》各篇非常熟悉，并根据自己多方找到的资料以及在宫中听到的轶事传闻，将其中有价值的部分补进《史记》。《外戚世家》中提到：“褚先生曰：臣为郎时，问习汉家故事者钟离生。”《田叔列传》中讲：“褚先生曰：臣为郎时，闻之曰：田仁故与任安相善。”《日者列传》中说：“褚先生曰：臣为郎时，游观长安中，见卜筮之贤大夫，观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动，誓正其衣冠而当乡人也，有君子之风。”在补《三王世家》时，他也提到自己是“窃从长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书，编列其事而传之……”这说明褚少孙所补之事很多是他亲身所闻见的。而且他尽量收集各方面的材料，并尽量揣测司马迁的本意，使其续补的部分基本符合《史记》的风格。

对褚少孙所补《史记》的评价历来说法不一，继张晏“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言辞鄙陋，非迁本意”^①的说法之后，很多学者对褚少孙所补《史记》持否定态度。张守节在注《龟策列传》时说：“《史记》至元成间十篇有录无书，而褚少孙补《景》、《武纪》、《将相年表》、《礼书》、《乐书》、《律书》、《三王世家》、《蒯成侯》、《日者》、《龟策列传》。《日者》、《龟策》言辞最鄙陋，非太史公之本意也。”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褚先生补史记》条说：“而褚所补亦惟《武纪》其余特附益于各篇中如赘疣耳。《武纪》之补，固属可笑，其余皆鄙琐无谓，或冗复混目……惟《外戚世家》有数句可取。”这些观点多为诋毁之词，失之偏颇，代表了一些学者对褚少孙所补《史记》的态度。

也有一些学者对褚少孙所补《史记》是肯定的。明代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褚先生集》评价说：“读其所记景帝王后、武帝尹、邢两夫人，与梁王、田仁、任安诸逸事，及滑稽六章、日者、龟策二传，

^① 《汉书·司马迁传》颜师古注引 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错综尔雅 状形貌 缀古语 竟有似太史公者。……予为采列独出 使世知龙门而下 扶风而上 尚有褚生 以当史家小山云。”张溥把褚少孙与司马迁及班固相提并论虽不恰当 但对褚少孙所补《史记》“状形貌，缀古语，竟有似太史公者”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的。清人王昶在《春融堂集》卷四三《书褚先生史记后》中说：“少孙 颍川人 仕元、成间。韦棱云：梁相褚大弟之孙，宣帝时为博士，寓居于沛，事大儒王式 续《太史公书》。其纪霍光家世 闻之方士考功 纪外戚 问钟离生 记梁孝王 问宫殿中老郎吏 编三王封策 取之长老好故事者。虽芜杂不经 亦可谓多识前言往行矣。”对褚少孙的学识及其补《史记》时多方搜集材料的情况有所论述。

褚少孙学识渊博 他在细心研读《史记》的基础上 对司马迁的著史本意及文章风格都有较准确的把握。再加上他所处年代距离司马迁写作《史记》还不太遥远 他在宫中任郎官时 还可以亲身去访问一些当时还健在的历史的见证人，从而使其所补《史记》各篇能够较真实客观地记载史实。由于《史记》在流传中确有残缺，《史记》在记事方面也有疏漏之处，所以褚少孙的补作在保持《史记》全书的完整性和补《史记》原书之缺方面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而且在今天所看到的褚少孙补作的各篇中 不乏精彩的叙述 如其所补《滑稽列传》中的“西门豹治邺”一段，就成为至今仍广为传诵的名篇。所以对褚少孙所补各篇不能一概否定，而应从记载史事是否真实，文章风格是否与《史记》统一等方面去具体分析。

《史记》流传后 除去有学者专门续写武帝以后的西汉史 以及褚少孙增补亡缺外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后人有意地对《史记》内容进行了改动。郑樵《通志》卷五下中讲：“臣谨按 张晏曰 自《景帝》至《平帝本纪》皆王莽时刘歆、扬雄、冯衍、史岑等所记。惟《武帝纪》 迁没 其书残缺 褚少孙补之 所谓褚先生是也。”这里郑樵引用张晏的说法 认为刘歆、扬雄等人对《史记》内容作了改动。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对刘歆篡改古书之事详加考证 其中也提到《史记》被窜乱的问题。崔适在《史记探源》中也提到《史记》中多篇都有被窜乱的可能：“适案 今之篇目篇文 不但非太史公之旧 亦非班固、张晏时之

旧。今十篇皆补 无一缺者 转视班、张时为备矣 其可信耶 正足为残缺益多之反比例也。《武纪》等篇 亦非褚先生补。八书皆贗鼎 斤斤于《兵书》、《律书》之辨 枉寻直尺而已。惟《景纪》、《傅靳列传》转不似缺 今姑舍是 证其为通篇皆伪者二十有九：《文纪》、《武纪》、《年表》第五至第十八《书》、《三王世家》、《张苍》、《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循吏》、《汲郑》、《酷吏》、《大宛》、《佞幸》、《日者》、《龟策》等十二列传是也。唯《年表》第五至第九 当是褚先生补 余皆非才妄续。这里提到的后人有意地增补和改动《史记》的情况 使得原本就很难搞清楚的《史记》残缺和续补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如果刘歆等人有意窜乱古史以为己用的情况真的存在的话，那就更是增添了辨别《史记》各篇真伪的难度。但因崔适、康有为都是以今文家的观点去作论断，所以其观点是否可信应认真考虑。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读史者在读《史记》时把自己的心得或其他资料随手写在篇后 被后代读史者又当作《史记》原文而抄入正文中 无意之中窜乱了原作。

二、《史记》书名的由来

《史记》书名的由来是历来争论较多的一个问题。书的名目，不管是他人所定 还是作者自己命名 都必有一定的原因，《汉书·艺文志》中讲：“古之王者世有史官 君举必书 所以慎言行 昭法式也。左史记言 右史记事 事为《春秋》 言为《尚书》 帝王靡不同之。”由此可知“史”是古代负责是记录帝王言行的官吏 清孙星衍在《尚书今古文注疏》卷十七中引郑玄注说：“太史、内史 掌记言行。”由此可知古代的史官有左史、右史、太史、内史之分。《孟子·离娄》中说：“晋之《乘》 楚之《檮杌》 鲁之《春秋》 一也。”史官所记之史的名称因地域不同而各有差异 但如果加以总名或通称 都可称之为“史记” 因为都是各国史官的记录。所以，最初“史记”二字应是史书的通称而不是专指某一史官的记录。

在司马迁书中“史记”二字也是经常见到的，如：

《周本纪》：“周太史伯阳读史记曰：‘周亡矣。’”张守节《史记

正义》：“诸国皆有史以记事 故曰史记。”

《十二诸侯年表序》：“是以孔子明王道 干七十余君 莫能用 故西观周室 论史记旧闻 兴于鲁而次《春秋》。”

以上两条所提到的“史记”都是指周室所藏的史书。

《十二诸侯年表序》：“鲁君子左丘明 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 成《左氏春秋》。这里的‘史记’指《春秋》。”

《六国年表序》：“秦既得意 烧天下《诗》、《书》 诸侯史记尤甚 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 多藏人家 而史记独藏周室 以故灭。这里的‘史记’是指各诸侯国史书。”

《天官书》：“余观史记 考行事。”这里的‘史记’是指汉代史书。

《陈杞世家》：“孔子读史记至楚复陈 曰 贤哉楚庄王！”

《孔子世家》：“子曰：‘弗乎弗乎 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 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 上至隐公 下讫哀公十四年 十二公。”

《十二诸侯年表序》：“孔子 西观周室 论史记旧文。”

这三处提到的《史记》都是指鲁国史书。

《太史公自序》：“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 而诸侯相兼 史记放绝。”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 史记石室金匱之书。”

这里的“史记”是泛指先秦至汉初的史书。

以上所引这些篇章里提到的“史记”，都是指先秦或汉代的史书，可见“史记”是汉代以前对各国史书的通称。所以司马迁为了有别于这一通称，就不会再以“史记”命名其书了。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凡百三十篇 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为《太史公书》。”为什么司马迁要自定书名为《太史公书》 以及其中‘太史公’的含义 历来存在争议。

因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先讲‘谈为太史公’后又说‘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很多人据此认为太史公是司马迁对其父的尊称。颜师古《汉书·司马迁传》注中讲：“谈为太史令耳 迁尊其父 故谓之公。”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十中继承了这一说法：“非三公不得称

公。……太史公者，司马迁称其父谈，故尊而公之也。”与这种说法相对，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太史公”是别人对司马迁的尊称。裴骈《史记集解》引韦昭《汉书音义》的说法：“说者以谈为太史公，失之矣。《史记》称迁为太史公者，是外孙杨惲所称。”《史记索隐》引桓谭的说法：“而桓谭《新论》以为太史公造书，书成示东方朔，朔为平定，因署其下。太史公者，皆朔所加之者也。”^①都认为《太史公书》中的“太史公”是指司马迁。另一种折中的说法是太史公为官名，司马谈和司马迁父子两人先后担任了这一官职。《史记集解》引如淳的说法：“《汉仪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迁死后，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②《史记索隐》引虞喜《志林》：“古者主天官皆上公，自周至汉，其职转卑，然朝会坐位犹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属仍以旧名，尊而称公，公名当起于此。”^③清梁玉绳继承了这种说法：“但一部《史记》均称太史公，惟《自序》中‘迁为太史令’一句称令，然《正义》引《史》作‘公’，疑今本传讹，或依《汉书》改，岂尽惲增之耶？《索隐》以为姚察非之矣。盖太史公是官名，卫宏汉人，其言可信，《西京杂记》、《隋书·经籍志》、《史通·史官建置篇》、宋三刘（敞、放、奉世）《两汉刊误》并同卫宏也。”^④但《汉书·百官公卿表》中没有提到“太史公”这一官名，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自己：“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⑤可见当时太史公的地位并不像如淳等人所说的“位在丞相上”，晋灼、臣瓌、宋祁等都以此为依据驳斥太史公为官名的说法。此外，还有与太史公是官名的说法相类似的一些说法，如太史公为太史令之尊称，太史公为官府之通称，及太史公为太史官之假借等说法，在此不一一赘述。

① 《史记·孝武本纪索隐》中华书局 1982年版。

② 《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中华书局 1982年版。

③ 《史记·孝武本纪索隐》中华书局 1982年版。

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一 中华书局 1981年4月版。

⑤ 《汉书·司马迁传》引 中华书局 1962年版。

《太史公自序》中记述司马迁与壶遂谈到其著书之意时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这说明司马迁是以周公、孔子自比的。而之所以定书名为《太史公书》而不称《太史公春秋》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卷五中解释说：“按子长述先人之业作书继《春秋》之后成一家言故曰《太史公书》。以官名之者承父志也。以虞卿、吕不韦著书之例言之当云《太史公春秋》不称春秋者谦也。除自谦之意外，恐怕还是因为司马迁要在《春秋》的基础上有所突破。虽然司马迁是要效法孔子作《春秋》而作《史记》但他还是有所顾忌的所以在壶遂将其著述与《春秋》相提并论时他赶紧否认‘唯唯否否不然……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司马迁著《史记》是要通过对具体事实的记述来表明自己的思想和史观并不完全像《春秋》那样蕴涵微言大义所以也没有必要以‘春秋’命名其书了。”

尽管对《太史公书》中“太史公”的含义说法不一但有很多材料表明，两汉之际人们对司马迁所著书的叫法多与“太史公”有关。如《论衡·对作》中讲：“《太史公书》刘子政《序》班叔皮《传》可谓述矣。”《汉书·宣元六王传》记载：“刘宇后年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后汉书·班彪传》中说：“夫百家之书犹可法也。若《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后汉书·杨终传》记载：“（终）后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都称司马迁所作史书为《太史公书》。”

《汉书·杨敞传》中说：“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应劭《风俗通·皇霸篇》中说：“谨按《战国策》、《太史公记》”称司马迁所著书为《太史公记》这里的“记”与“书”是同义词都有“著录”的意思。

《汉书·艺文志》在《春秋》家下著录“《太史公》百三十篇”；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都省去了“书”字。从同见于《汉书》的《太史公